

史記注譯

(一)

王利器 主編

三秦出版社

王利器

主編

一本紀表

史記注譯

三秦出版社

修订说明

《史记注译》初版时间为1988年，1992年修订重印过一次。此次是第二次修订，也是较为深入细致的一次修订。

第一次修订，因为种种客观原因，修订面较窄，只是改正了正文中的一些错别字；而注释、译文中的差错，未作多少改动。因而事后不少读者反映：重印后的《史记注译》，仍然存在着一些差错。

此次修订，由副主编张烈先生担任执行主编，全权处理编务和版权事宜。首先通知每位作者认真负责修订自己注译的篇目内容，然后将情况汇集到执行主编处，由执行主编统稿把关，进行加工。不止是改正了正文中残存的不少错别字，还对注释、译文作了全面深入的修订。我们这样作，既发挥了每位作者的主动性、积极性，体现了文责自负的原则；又有统一的格式规范，体现了全书内容和形式的完整性。经过全体作者的一致努力，此次修订后的《史记注译》，其质量较之初版或上次重印版，当有一定幅度的提高。

该书属于古籍整理，不是历史著作。所以，我们的追求不在论点的推敲和材料辞章的取舍，而在于对正文作出通俗、准确的注释和信、达、雅的今译。此次修订，我们就是本着此一宗旨进行的。

诚然，《史记注译》此次修订，仍然是在原有纸型上作出挖改，只能小改，不能大改，这就使得此次修订受到一定局限。不尽之处，敬请读者原谅。

自从《史记注译》一书问世以来，至今将近八年。这期间各作者在业务上、学术上均有长进，其职务、职称有的发生了变动。这些情况均在作者简介栏里反映出来。再者顾问张舜徽先生已于1992年11月辞世，我们在此谨对这位学界前辈表示深切的怀念。

《史记注译》编委会

1996年6月

封面题签：周谷城
 责任编辑：周鹏飞
 封面设计：解维国
 淡懿诚

顾问

张舜徽

刘乃和

主编
 副主编
 编委

(以姓氏笔划
 为序)

王利器
 张烈
 田久川
 陈蒲清
 曹日升

陈秉才
 李庆善
 陈锦霖
 龚浩康

曹相成
 祁念曾
 夏琼英
 路志霄

史记注译序

我们祖国的古代文化遗产，如果完全不能为今人所接触，那便等于没有。能发生接触的办法，只有两个：或则提高阅读古汉语的能力，或则把古汉语译成现代文。凡研究所或大学文科研究人员自以提高阅读能力为必要；对一般读者来说，只需把古汉语译成现代文就行了。由曹日升等同志编撰的这部《史记注译》，无异于用现代文著的《史记》，最便于读者；对一般读者阅读古籍有帮助，对发扬光大古代文化遗产更有功劳。是一部好书。祖国古代文化遗产丰富，大部分都要如此加工一番。从今以后，希望这个工作能逐步开展。余不多叙，即以此为序。

周行城

1985年2月17日于北京

前言

引子

华夏炎黄，本深木茂，源远流长。溯禅让雍容，唐尧虞舜；兵戎革命，周武商汤。五霸会盟，七雄征战，诸子百家各主张。迨秦汉，开九州一统，勋业辉煌。

龙门司马子长，创巨制鸿篇立史皇。盖记事记言，体兼《左》《国》；寓褒寓贬，功继素王。学究天人，道通今古，述往思来为激扬。齐击节，赞风骚韵味，经典文章！

——调寄《沁园春》

秦王朝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统一，建立起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接着又统一了文字，这本来使文化学术的进一步发展获得了有利的条件。可是秦始皇不顾客观形势变化，继续坚持专制暴政，采取“焚书坑儒”的极端措施，实行摧残文化、禁锢思想的错误政策，这就给文化学术的发展造成了厄运。事物向极端发展，总是要走向它的反面的。由于秦始皇实行了这一类的错误政策，结果导致本来是强大的秦王朝却在农民大起义的打击之下迅速土崩瓦解，归于灭亡。

西汉王朝是利用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果实建立起来的，它从正反两方面吸取了秦王朝的经验教训。“汉承秦制”，它基本上继承了秦王朝的政治制度，但却采取了许多很不相同的政策和策略。从汉高帝到汉景帝的六十多年间，西汉统治集团的总的指导思想是“休养生息”。因此，到汉武帝于公元前一四〇年登上帝位的时候，出现了“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网疏阔”这种政治经济上的小康局面^①，这就是历史上史学家所称道的“文景之治”。这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黄金时代，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文化学术方面也出现了繁荣兴盛的景象。

由于政治经济形势和文化学术事业的不断上升，时代向人们提出了整理古今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并用来说明当时社会生活实际的要求。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就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么回事^②。

图书典籍是文化学术的结晶，在秦、汉之际，遭到了秦始皇和楚霸王两次大规模的焚毁，“竹帛烟销”，“关河空锁”，这在我国文化学术史上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到汉惠帝时，才正式宣布废除禁止私人收藏图书的法令。到汉武帝时，更进一步建立了国家图书馆——石室金匱，派遣专人广泛搜集和抄写书籍，国家保存的书籍便逐渐丰富起来。这

是当时文化学术繁荣昌盛的标志，也更是学者专家们进行研究和从事著述的有利条件。

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和他的不朽巨著——《史记》，就诞生在这样的时代。

二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县龙门（在今陕西省韩城县南）人。大约出生于公元前一四五年（汉景帝中元五年）³，到公元前九〇年（汉武帝征和三年）以后去世¹。他出身于史官世家，远祖曾经在周代累世担任史官，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作过很长时间的太史令²。他童年时期曾经在家乡参加过农牧劳动，十岁开始学习古代典籍，后来跟随著名的经学家董仲舒、孔安国研究过《春秋公羊传》和《古文尚书》，深刻了解先秦和汉代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及其斗争的历史，还具有相当广博的天文历数知识。他在学术方面的渊博知识和文学方面的精湛修养，是他能够写作《史记》的重要主观条件。

他二十岁上开始到祖国各地作长途旅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⁴。他经过这次长途旅行，广泛地考察了社会生活，了解了民情风俗，探寻了许多历史传说的遗迹，搜集了许多历史人物的传闻逸事。后来，他开始了作官的生涯，担任了汉武帝的侍卫官——郎中。在三十五岁的时候，他曾经“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⁵，参加了平定和开发西南夷的斗争，又有机会得以了解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山川形势和风俗习惯，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见闻。三十八岁的时候，他继承父亲的遗职，也作了太史令，就开始了写作《史记》的准备工作。四十二岁的时候，他在主持制定《太初历》的工作以后，就正式开始写作《史记》了。

司马迁四十八岁的时候，因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处宫刑。这个事件在司马迁的生命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既给他在精神上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巨大创伤，可是也更加激发了他奋发写作，出色地完成《史记》这部鸿篇巨著的决心和毅力。今天的《史记》，就是他生命升华的产物。对于这桩历史公案，如果让我们时隔两千年的《史记》读者来评判的话，那我们要说的是：李陵的投降是可耻的，是应当受到谴责的；而司马迁为他辩护的动机却是纯正的，理由也是值得同情的；可是处在那样的封建专制时代，汉武帝的严酷处置也是不足为怪的：这就是历史的悲剧。因此，今天我们读起司马迁那篇掷地有声的名作——《报任安（少卿）书》来，总是要受到深刻的感动，产生强烈的共鸣，不能不为他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五十岁的时候，他被赦出狱，担任了中书令。这是一个本来由宦官担任的职务，虽然“尊宠任职”，可是对司马迁来说，却无异于在精神上加判了无期徒刑。

经过十多年的辛勤劳动，到五十五岁的时候，他的毕生心血的结晶——《史记》完成了，他的“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的伟大理想终于实现了⁶。就在这一年的冬季，他写下了《报任安书》那篇名文。那是《史记》的千载不绝的余音，也是《史记》的祝捷凯歌。从这以后，史籍中就再没有关于他的活动的记载了。

三

“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名⁷，司马迁称他自己的这部著作作为《太史公书》，这

就是《史记》的原名。大概东汉班彪、班固父子开始非正式地专称《太史公书》为《史记》¹⁰，一直到唐代编写的《隋书·经籍志》才正式把《史记》作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我国早在商代就设立了史官，虽然他主要是掌管天文历法，但是朝廷的记言记事也是他的职责。《尚书》就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料汇编。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代，陆续出现了一些专门的历史著作，如《春秋》、《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可是到《史记》诞生以前，一直没有一部全面的通史。自从《史记》问世，才开始出现了内容全面、体制完备、规模巨大的历史著作。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仿照《春秋》的体例，按年月记载大事，作为全书的总纲。“表”仿照周代史官谱牒的体例，创立“世表”、“年表”、“月表”三种形式，记事最为简明扼要。“书”仿照《尚书·禹贡》和《礼经》的体例，概述古来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成就。其中的《天官书》、《历书》、《河渠书》、《平准书》，总结了天文学、历数学、地理学和经济学的知识，是科学体系的雏形，有着重大的意义。“世家”是纪传结合的国别史，其中包括有从西周至战国时期许多重要的诸侯国的历史。“列传”主要有“专传”、“合传”、“类传”，记载重要人物的事迹，但其中也包括特殊事业传、少数民族传、藩属国传、外国传等，叙述的方面非常广泛。五个部分互相联系，互相补充，而以“本纪”和“列传”作为经纬线，构成了一个完备的整体，在我国古代的历史著作中是空前的伟大成就。

《史记》改变了以往分国割据的历史概念，建立起我国历史的统一观和正统观。它的十二“本纪”上起五帝，经历三代一直到秦、汉，一脉相传，这种历史体系表示着国家的统一和人心的统一。这是秦、汉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在史学观念上的反映，对于以后两千年间我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起了深刻的积极作用。

《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史书，成为了封建时代修史的范式，一直被以后历代史学家所推崇，接踵而起的是《汉书》，一直到《明史》，合称“二十四史”¹¹。这些被公认为所谓“正史”，它们的体例虽然各代略有改变，但大体总是遵循《史记》的成规。《史记》在过去史学界所占有的崇高地位和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由此也就可以想见了。

《史记》是我国古代的第一部通史，整理和保存了自从传说的五帝时代直到西汉中叶三千年间大量的历史资料，给我们今天研究那一段历史提供了全面的、系统的资料，为我国的历史学奠定了最初的坚实基础。

《史记》不仅是历史巨著，而且也是古典文学的名著。司马迁运用他那敏锐深刻的观察力和匠心独创的艺术手法，塑造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形式。如《项羽本纪》、《魏公子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等篇所描写的那些历史人物，形象丰满，个性鲜明，声音笑貌栩栩如生，让我们今天读来，还仿佛如临其境，如见其人。这些人物和事件，有的就成为了后代小说、戏曲的题材。以后汉、魏、六朝的《列仙传》、《高士传》，唐、宋的传奇，明、清的志怪小说等，在体裁形式上也都是从《史记》发源的。尤其是《史记》那种准确精练、鲜明生动的语言风格，是汉代散文的最高成就，更成为唐、宋以后散文家们所揣摩效法的典范。

四

正因为《史记》在史学和文学两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所以两千年来人们对它的评

价一直是很高的。比司马迁稍后的著名经学家、文学家刘向、扬雄就都对它评价很高。东汉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班固，由于保守思想严重，对司马迁的比较自由的思想观点有很多不同意见，可是他也仍然首次给予了比较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肯定：“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¹²南宋史学家郑樵说它“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¹³清代文学家、史学家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¹⁴直到现代，鲁迅先生也认为《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¹⁵，充分肯定了它在史学上、文学上的伟大成就。

也正因为《史记》的内容很丰富，可以说得上是体大思精，所以自汉至今学习和研究《史记》的人很多，注解、疏证、评论《史记》的专著也不少。特别是在清代，研究《史记》蔚然成风，名家名著盛极一时。历代研究《史记》比较重要的著作有南朝宋代裴骃的《史记集解》、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明代凌稚隆的《史记评林》、清代王元启的《史记正讹》、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和崔适的《史记探源》等，还有近人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陈直的《史记新证》和日本汉学家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这些都是我们今天阅读《史记》的主要参考书籍，本书也正是根据这些资料注释的。

五

我们称道了《史记》的那么多优点，是不是意味着它就是尽善尽美了呢？当然不是。首先，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根本目的是为颂扬西汉王朝的明圣盛德，维护封建统治制度服务；其次，《史记》所表现的以帝王为中心的英雄史观，二元论的世界观，动摇不定的天命观，宿命论的迷信思想，这些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都在它身上留下了程度不同的烙印。但是总的来看，司马迁生活在两千年前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他的史学成就远远超过了他的前人，他的思想认识水平也超过了他的同时代人，这是他的主要的基本的方面。

还有一点就是《史记》某些文字的出入和部分篇章的真伪问题，我们也得有所了解。司马迁广泛地搜集了上下几千年的文献典籍，整理选择，融会贯通，编写《史记》这样的空前巨著。这是一项创造性的劳动，单就资料的整理来说，工作就非常艰巨复杂，因而疏漏讹误甚或彼此牴牾、前后矛盾，这类毛病本来就是难免的。更何况《史记》先经过一千多年的传钞，再经过将近一千年的转刻¹⁶，不光是字句有了出入，而且是篇章有补缀，有删改，有窜乱。其间重要的蛛丝马迹有这样一些：第一是西汉元帝、成帝时期褚少孙的正式补作，大都是至今有据可查的。其次是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缺了十篇，有录无书，可是他并没有交代缺的是哪些篇，这就留下了疑案。再次是东汉章帝让杨终对它进行了一番讨伐性的删砍。然后到三国时张晏才说亡失的是《孝景本纪》、《孝武本纪》、《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礼书》、《乐书》、《律书》、《三王世家》、《傅靳蒯成列传》、《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并且说褚少孙补作了其中的《孝武本纪》、《三王世家》、《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他虽然能够指篇道目，可是后人对他的说法仍然有很多异议。直到清末，崔适在《史记探源》中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认为《孝文本

纪》等二十九篇全是冒牌货色¹⁷，并且认为其中除了《年表第五》至《年表第九》等五篇可能是由褚少孙补作以外，其余的都是所谓“非才妄续”，这更与张晏的说法大相径庭了。我们认为崔适的立论有不少可贵的创见，可是也有许多令人不敢苟同的武断，因为他的今文学派的门户之见实在太深了。

再举一个《史记》记事的下限问题，有说止于汉武帝元狩以前的，有说止于太初的，有说止于天汉的，有说止于征和的¹⁸，而现在通行的《史记》则是止于汉成帝鸿嘉元年了¹⁹。这当然是出于后人的续补。如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就启示我们一个道理：学习古代典籍，都不要钻牛角尖，不要搞烦琐哲学。正像归有光所说的那样：“古书宜略会文意，疑者阙如可也。”

六

“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²⁰我们认为《史记》就属于这种珍贵遗产的范围，应当很好地批判继承它，让它能够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然而今天的青年一代对于两千年前的名物制度和文言文，阅读理解一般都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联合起来编写了《史记》的这个现代注译本，目的不是研究和评论《史记》，而是给青年一代学习《史记》设置阶梯，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工具，创造辅助条件。我们这种工作的先驱者裴骃说得好：“瞻星之继朝阳，飞尘之集华岳。”如果瞻星能助朝阳发出灿烂的光辉，飞尘能让华岳显出峥嵘的秀美，我们的工作能让《史记》这颗古代文化遗产的明珠呈现晶莹的光泽，从而为建设高尚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微薄的贡献，那就是我们的最大愿望。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教，多加是正！

曹相成

一九八三年一月于龙州书舍

【注释】

① 引自班固《汉书·刑法志》。

② 引自《汉书·司马迁传·报任安书》。

③ 根据王国维《观堂集林·太史公行年考》。

④ 根据《汉书·司马迁传》、《汉书·武帝纪》、《汉书·戾太子传》推断。

⑤ 太史令属于太常，秩六百石，掌管天文、历法和国家瑞应、灾异的纪录。

⑥ ⑦ ⑧ 均引自《太史公自序传》。

⑨ 《太史公自序传》中有“史记放绝”、“细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的话，这里的“史记”都是泛指古代史书；《史记》其他篇中这样的用法还有多处。

⑩ 参见《汉书·五行志》和范曄《后汉书·班彪传》。

⑪ “二十四史”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民国时代，有人加进《新元史》，合称“二十五史”；如果再加进《清史稿》，也不妨称它们为“二十六史”。这种纪传体史书的编写体例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从此可能成为绝响了。

12 引自《汉书·司马迁传·赞》。

13 引自郑樵《通志·序》。

14 引自赵翼《廿二史劄记》。

15 引自《鲁迅全集·汉文学史纲要》。

16 《史记》有刻本大概始于公元994年（北宋太宗淳化五年）。

17 这二十九篇是指《孝文本纪》、《孝武本纪》、《年表第五》至《年表第十》、《八书》、《三王世家》、《张丞相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循吏列传》、《汲郑列传》、《酷吏列传》、《大宛列传》、《佞幸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

18 元狩（前122年——前117年）、太初（前104年——前101年）、天汉（前100年——前97年）、征和（前92年——前89年）都是汉武帝的年号。

19 鸿嘉元年相当于公元前20年。

20 引自《毛泽东选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太史公书管窥

王利器

《太史公书》与《史记》

《太史公自序》云：“为《太史公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¹。”《晋书·张辅传》：“又论班固、司马迁云：‘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²”盖举成数而言。《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一引李方叔《师友谈记》作“七十万言”，“七”盖古文“五”字之误。此《太史公书》字数之可得而言者。《后汉书·杨终传》：“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子山所删之本，未知何似；而《太史公书》之言互见者，亦时有未能相照应，如《朱建传》述平原君谏淮南王反事云：“语在《黥布》语中。”《集解》云：“《黥布列传》无此语。”又《滑稽列传》叙淳于棼以隐说齐威王事云：“语在《田完世家》中。”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十五曰：“《世家》无隐谏一节，疑是后人删之。或谓此传虚述，乃史公不精之咎，恐不然也。”故居今日而讨求他书之引《史记》为今本所无者，则必首当分别其为《太史公书》与否。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十六曰：“至于逸文坠句，往往见于他书，如《汉书·五行志》中上、中下屡称《史记》，师古谓皆指迁所撰，或未尽然。但《志》中下引《史记》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水经注》十九引之，明言是《史记·秦本纪》。《御览》五十九、六十二引《史》并同。又《论衡·禄命篇》引太史公曰：‘富贵不违贫贱，贫贱不违富贵。’此皆汉人所引，得毋被杨终删之，而世犹有真本在耶？《左传·僖公五年》注‘傅说星’³，《孟子·离娄·疏》‘西施入市’，《经典释文》‘庄子字子休’⁴，及《骈拇·音义》‘师旷无目’，《史通·叙事篇》之‘立’，《说文系传》‘杲’字注之‘反景桑榆’，‘偿’字注之‘代王偿债’⁵，今本俱无。他若《水经注》、《后汉书注》、《文选注》、《广韵注》、《太平御览》、《初学记》、《艺文类聚》、《通志·氏族略》等书，均有引《史记》之语，不能尽录。而《御览》尤多，虽未免舛讹，究难尽没，岂历经传写，复有损削欤？”今按：关于他书引《史记》而不见于今本者，宋人盖已注意及此。如《容斋三笔》卷一：“上元张灯，《太平御览》所载《史记·乐书》曰：‘汉家祀太一，以昏时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观灯，是其遗事，而今本《史记》无此文。”是其例。梁氏读书得间，发愤立言，其识固已度越前人，惟义有未密，事多可商，辄复类聚而论列之。

（一）一本

《商君传》：“搗矛而操闔戟者。”《史记集解》：“徐广曰：一作‘奈屈卢之劲矛，干将之雄戟。’”按《文选·吴都赋》李善注引《史记》曰：“赵良曰：屈卢之劲矛，干将之雄戟。”正与一本合。干将、莫邪，古又以为大戟名。《史记·司马相如传》：“《子虚赋》云：‘建干将之雄戟。’”《淮南子·主术篇》：“兵莫憚于志而莫邪为下。”《史记集解》引许慎注：“莫邪，大戟也。”《汉书·扬雄传》：“杖钺邪。”注亦云：“钺邪，大戟也。”《后汉书·文苑·杜笃传》注、《说文系传·金部》“钺”下注，俱以为大戟也。《广雅·释器·疏证》以“干将、莫邪乃连语，状其锐利，非人名。”

《高祖本纪》：“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服虔曰：“准音拙。”应劭曰：“准，颊权准也。”《一切经音义》卷七十五引《史记》作“汉高隆颡龙颜。”今按：《一切经音义》所引与服虔音义合，即一本也。日本丹波康赖《医心方》附注云：“颡，距员反，《广雅》云：‘颡也。’《玉篇》云：‘颡，之劣反，汉高祖隆颡龙颜。又之出反。’”检今本《玉篇》同，唯无“之出反”语。“隆准”作“隆颡”，与服、应二家妙合，而丹波附注于《玉篇》外，又引《广雅》，其义趣适相发明，疑出希冯原本所用《史记》此文旧说故然，从知此文旧有两本：一作“隆颡”，史公原本也；一作“隆准”，汉魏之际改本也。服、应注《汉书》亦据作“颡”之本，及后改本盛行，而原本反致寂沦，驯致服、应注义，顿失本主。故宫藏唐本《切韵·十六薛》云：“颡颊。”《广韵·十七薛》云：“颡，面秀骨。”秀读为透，谓颡骨透出面也；若准自为鼻头，《后汉书·光武纪》注引许负云：“鼻头为准。”《广韵·十七薛》“准”下引李斐云：“准，鼻也。”鼻头隆起与颡骨秀出，判然殊状，从知服音应义作“准”之字，皆出后人妄改，今得慧琳及丹波书以证之，可以涣然冰释矣。

《孔子世家》：“至于河而闻竇鸣犊、舜华之死也。”《集解》：“徐广曰：‘或作鸣犊竇犂。’”今按：《汉书·刘辅传》注：“师古曰：‘……《史记》及《古今人表》并以为鸣犊、竇犂。’”犊、犂声转字异，与徐广引或本合，《孔丛子·记问篇》亦作“鸣犊竇犂”。

《鲁世家》：“甚矣鲁道之衰也，洙、泗之间，断断如也。”《索隐》：“断音鱼斤反，读如《论语》‘闾闾如也’，……今按下文云‘至于揖让之礼则从矣’，鲁尚有揖让之风，如《论语》音闾为得之也。”今案：《文选》李萧远《运命论》：“闾闾于洙、泗之上。”李善注引《史记》曰：“甚哉鲁之衰也，洙、泗之间，闾闾如也。”与小司马说合。此《史记》之一本也。

《老子韩非列传》：“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索隐》：“其书十余万言，率皆立主客，使之相对语，故云偶言。又音寓，寓，寄也。”张文虎以为：“依《索隐》，则所据本史文‘寓’作‘偶’，今单本亦作‘寓’，盖后人改之。”其说是也。《索隐》又云：“胠音祛，又音去。”则与《正义》作“丘鱼反”之音各别。寻《庄子·胠箧篇》《音义》：“胠，李起居反，《史记》作协，徐起法反，一音虚乏反。”李音与《正义》音合，徐音及一音与《索隐》音合，然则《索隐》所据作音之本，即《庄子音义》所引《史记》作“协”之本也。

《太平御览》卷七十九引《史记》：“颡项崩，而元器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原注：“与‘瞽’同。”按：今本《五帝本纪》作“瞽”，《史记会注考证》云：“枫山、三条、南化本云：‘瞽一作喾，音国。’”则《御览》此条所据为一本也。

（二）旧注

后人征引《史记》，有以旧注为本文者。《蒙求旧注》卷中：“《史记》：‘淳于髡博闻强学，其谏说慕晏婴之为人，然而承意观色为务，故齐人曰炙轹髡。轹者，车之承膏器，炙不尽，犹有余流。盖言髡智不尽，如炙轹耳。’”《太平御览》卷七百七十六引《史记》：“淳于髡者，齐人也，博闻强学，其谏说慕晏婴之为人，然而乘意观色为务，故齐人谓之炙轹。轹者，车之盛膏者，炙之不尽，犹有余流。言髡之智不尽，如炙轹。”今按：《孟子荀卿列传》：“炙轹过髡。”《集解》引刘向《别录》：“‘过’字作‘轹’。轹者，车之盛膏器也，炙之虽尽，犹有余流者。言淳于髡智不尽，如炙轹也。”《索隐》亦引《别录》此文，“流”作“津”。

《一切经音义》卷十七引《史记》：“以冠纓绞煞人。”今按：此见《吴太伯世家》：“王徐祭七年，楚公子围弑其王夹敖而代立，是为灵王。”《索隐》：“孙卿曰：‘以冠纓绞之。’”又卷五十九及卷七十引《史记》：“陶，瓦器也。”今按：此见《五帝本纪·正义》。又卷四十引《史记》：“晕，日月旁气也。”今按：此见《天官书·集解》。又卷四十六引《史记》：“锋鏑或作铍鏑鏑也。”今按：此见《秦楚之际月表·集解》，今本无“鏑鏑也”三字。又卷八十六引《史记》：“破镜，恶兽名也。”今按：此见《孝武本纪·集解》。《续一切经音义》卷十引《史记》：“古者，贵贱悉称朕，自秦始皇二十六年始，天子独称也。”今按：此见《始皇本纪·集解》。

《太平御览》卷九百四引《史记》：“《徐偃王志》云：徐君宫人妊娠而产卵，以为不祥，弃于水边。孤独老母有犬名鹄仓，猎于水滨，得所弃卵，衔以来归，独母以为异，覆暖之，遂蛸蛸成小儿，生时正偃，故以为名。徐君宫中闻之，乃更录取收养，长而仁智，袭君徐国。后鹄仓临死更生角而九尾，实黄龙也。偃王葬之徐、梁县界中，今见有狗垄云。”今按：此见《秦本纪·正义》，又见《搜神记》卷十四、《博物志》卷七、《水经注》卷八及《太平御览》卷五百五十六引《述征记》，《正义》即引《博物志》为说，《御览》引作《徐偃王志》者，盖即谓《博物志》之志徐偃王耳。又卷五百七十七引《史记》：“荆轲左把秦王，右搯其胸；王乞听琴而死，召姬人鼓琴，声曰：‘罗縠单衣，可裂而绝；八尺屏风，可超而越；鹿卢之剑，可负而拔。’王奋而去。”今按：此见《刺客列传·正义》。又卷一百六十引《史记》：“扁鹊生卢，故曰卢医。”今按：此见《扁鹊传·正义》。

《说文系传·辵部》“遯”字注云：“《史记》有魏遯。”今按：《魏世家》及《六国年表》赧王栏，魏昭王之名皆失书，《魏世家·索隐》引《世本》：“昭王名遯。”则此以《索隐》为《史记》也。又《水部》“滇”字注：“《史记》：‘滇池，水原广，末更狭，似倒流，故曰滇池。’”今按：此见《西南夷列传·索隐》及《正义》。

（三）佚文

《太史公书》佚文，殊难断定，以后人称引其他记事之书亦名《史记》故也。然有称引《太史公书》及明著其书之小题，而不见于今本《史记》者，往往而有，钩其沉而辨其是非，是又不可不加意于此也。今略举数例以明之。

一事 《左传·僖公五年》疏：“天策传说星，《史记·天官书》之文。”《说文系传·日部》“杲”字注引《史记·天官书》曰：“日晡则反景上照于桑榆间。”今本俱无。孙星衍《问字堂集》卷三《天官书考补序》以为“《天官书》听阙诸星，疑史迁不如是之疏，传写者脱其文矣。”其说极是。今以《左传疏》引“天策传说星”之文观之，则《太史公书》自多遗失也。

二事 《后汉书·孔融传》注：“屈平，楚怀王时为三闾大夫，秦昭王使张仪谗诈怀王，令绝齐交，又诱请会武关；平諫，王不听其言，卒客死于秦。怀王子子椒、子兰谗之于襄王而放逐之。见《史记》。”按：今本《史记》无“子椒”，《新序·节士篇》、《盐铁论·讼贤篇》俱有之。

三事 《文选》曹子建《与杨德祖书》李善注引《史记》：“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今本《孔子世家》无“子游”。按：子建《书》曰：“昔尼父之文辞，与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辞。”即本《史记》为说，则子建所见本有“子游”也。

四事 《艺文类聚》卷十二引《史记》：“高祖讳邦，字季。”今《史记》无“讳邦”之文。《集解》：“《汉书音义》曰：‘讳邦。’”《索隐》：“按《汉书》：‘名邦，字季。’”“讳邦”之文，似不可少，而《史记》汉诸帝俱无讳，何也？

五事 《经典释文·叙录》：“庄子者，姓庄，名休。”原注引《太史公书》云：“字子休。”今本无“字子休”之文。李石《续博物志》卷四：“孟轲、庄周，其字不传。或云：轲字子舆，周字子休，皆后人以意为之耳。”孔平仲《珣璜新论》曰：“庄周字子休，出《列子音》。”今按见殷敬顺《列子释文》卷上《列子新书目录》，《晋书·隐逸传》有翟庄字子休，此明本“周字子休”之说为之，则魏晋人所见本自有“字子休”之文也。

六事 《续一切经音义》卷十引《韩非列传》：“姓李名聃，苦县人也，周定王元年乙卯，生于李树下，简王二年为守藏令，十三年为柱下史，敬王元年壬午，年八十五岁，西出散关。或云：葬于槐里。”按：此文较今本为详，引云《韩非列传》，固据老子、韩非合传本也。

七事 《太平御览》卷八十三引《史记》：“帝太庚在位二十五年崩，子帝小甲立。帝小甲在位十七年崩，弟雍己立。帝雍己在位十二年崩，帝大戊立。中宗在位七十五年。帝仲丁在位十一年。帝外壬在位五年崩，弟河亶甲立。河亶甲在位九年崩，子帝乙立。祖乙在位十九年。帝祖辛在位十六年崩，弟沃甲立。帝沃甲在位二十五年崩，立祖辛之子祖丁。帝祖丁在位三十三年乃崩，立沃甲之子，是为南庚。帝南庚在位二十九年崩，立祖丁之子阳甲。帝阳甲在位十七年。帝盘庚在位十八年。帝小辛在位二十一年。帝小乙在位二十年崩，子武丁立。帝祖庚在位七年崩，弟祖甲立。帝祖甲在位十六年崩，子廩辛立。帝廩辛在位六年崩，弟庚丁立。帝庚丁在位三十二年崩，子武乙立。帝太丁在位三年崩，子帝乙立。”按：今《殷本纪》，除外丙三年⁸、中壬四年外，俱无在位年数，以外丙、中壬之例绳之，则必当有而为后人所刊落耳。又《太平御览》卷八十五引《史记》周代各王亦有在位年数，而今本亦亡之矣。

八事 《太平御览》卷一百五十九引《史记》：“梁孝王筑东苑三百里，是曰兔园；又为复道，自宫属诸平台，三十余里。”按：今《梁孝王世家》无“是曰兔园”四字。

（四）称他书为“史记”

古代记事之书，率名“史记”，盖自周、秦以迄唐、五代，莫不皆然。其在《太史公书》断限以外者，此易辨知；若其在断限以内者，此非博览覃思，无以抉其是非也。夫《汉书·五行志》之以《国语》为“史记”，钱大昕已斥言之⁹；今请别举所知若干条，寻其本而反其真，使朱紫有别，庶几免乎子思所讥“谓狐为狸者，非直不知狸也，勿得狐，复失狸者也”¹⁰。

《玉烛宝典》卷四引《史记》：“甘罗曰：‘夫项橐七岁为孔子师。’”按：今《史记》无文。《战国策·秦策》下：“甘罗曰：‘夫项橐生七岁，而为孔子师。’”《淮南子·修务篇》：“夫项橐七岁为孔子师”¹¹。《太平御览》卷四十引《春秋后语》：“甘罗曰：‘夫项橐十岁为孔子师。’”“十”当为“七”，形近之误。

《周礼·春官·小宗伯》疏引《史记》：“九皇氏没，六十四民兴；六十四民没，三皇兴。”按：今《史记》无文。《小宗伯》郑玄注引郑司农曰：“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太平御览》卷五百二十六引《汉旧仪》：“祭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

皆古帝王，凡八十一姓。”

《艺文类聚》卷八十二引《史记》：“赵高将为乱，先设验，献蒲以为脯，惑二世，有言蒲者诛之。”按：今《史记》无文。王楙《野客丛书》卷二十二：“《文选》潘安仁《西征赋》曰：‘野蒲变而为脯，苑鹿化而为马。’铣注：‘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以蒲为脯，以鹿为马，献于二世，有言蒲与鹿者阴诛之。’按今《史记》但闻指鹿为马，不闻以蒲为脯之说，此见汉人杂说，臧荣绪《晋书》尝引以为言，欧阳询“蒲柳门”载赵高此事，谓出《史记》，误矣。”今按：《北堂书钞》卷一百四十五引《古今注》：“秦二世时，丞相赵高用事，乃先献蒲脯、鹿马，以验群臣也。”《金楼子·箴戒篇》：“秦二世即位，自幽深宫，以鹿为马，以蒲为脯。”《唐书·苏安恒传》：“指马献脯，先害善良。”俱有以蒲为脯事。

原本《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二引《史记》：“严君平卜筮于成都市，日阅数人，得百钱，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也。”按：今《史记》无文，见《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序》。又卷一百三十六引《史记》：“苏秦匹夫徒步之人，帽屨羸盖，轻策万乘之主。”按：今《史记》无文，见《淮南子·汜论篇》，《淮南》“轻策”作“经营”。

敦煌写本《古类书》（斯·七九）《贞男》云¹³：“颜叔子，鲁人也，独居一室，夜大雨，北舍屋崩，有女子来投宿，颜秉烛坐，烛尽，彻（撤）屋续火，至晓不二。周时人。出《史记》。”寻《蒙求旧注》卷中、《太平御览》卷八百六十八亦引《史记》此文。按：今《史记》无文，见《诗经·小雅·巷伯》、毛《传》及《荀子·大略篇》，《后汉书·崔骃传》注、朱子《四书或问》注、曾慥《类说》卷三十八引《韩诗外传》十及《家语·好生篇》载鲁男子事同。

《倭名类聚抄》卷一《人伦部·男女类》引《史记》“宁逢恶宾，不逢故人。”按：今《史记》无文，乃《西京杂记》卷上所载公孙弘语也，狩谷掖斋之笺注以为“源君误引”，盖未观其会通。

《一切经音义》卷八十一引《史记》：“籀者，周时史官教国子学童之书，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皆古文也。”今按：《史记》无文，见《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小学》。

《蒙求旧注》卷中引《史记》：“闵损字子骞，早丧母，父娶后妻，生二子，损孝心不息，后母疾之，所生子衣绵絮，损以芦花絮。父冬日令损御车，体寒失辔，父责之，损不自理，父察知之，欲遣后母。损启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父善之。母亦改悔，待三子均平，遂成慈母。”按：今《史记》无文。《艺文类聚》卷二十引《说苑》、《太平御览》卷四百一十三引师觉授《孝子传》，《初学记·人部》引萧广济《孝子传》，俱载此事。

《太平御览》卷九引《史记》：“庶女者，齐之寡妇，养姑，姑女利母财而杀母，以告寡妇，妇不能自解，以冤告天，而大风袭于齐殿。”按：今《史记》无文，见《淮南子·览冥篇》高诱注。《文选》江文通《诣建平王上书》“庶女告天，振风袭于齐台。”注引许慎《淮南注》同。又卷八十二引《史记》：“昔夏后启筮，乘龙以登于天，枚占于皋陶，皋陶曰：‘吉而必同，与神交通，以身为帝，以王四卿。’”按：今《史记》无文。《太平御览》卷九百二十九引《归藏·明夷》曰：“昔夏后启上乘龙飞，以登于天¹⁴，皋陶占之曰吉。”《路史·后纪》卷十三上注引《归藏·郑母经·明夷》：“夏后启筮，御龙飞升于天。”又卷一百九十四引《史记》：“相如为赵王奉璧使秦，王舍之广成传舍，古县也。或云：秦始皇

因为望海台。”按：今《史记》无文。《水经·巨洋水注》：“巨洋水东北经望海台西，东北流。伏琛、晏谟并以为平望亭，在平寿县故城西北八十里，古县。又或言秦始皇升以望海，因曰望海台，未详也。”又卷三百二十七引《史记》：“汉武帝患匈奴屡为边患，雁门马邑豪聂壹因大将军王恢言：‘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致之，伏兵袭击，必破之道也。’帝召问公卿曰：‘今欲举兵攻之，何如？’韩安国曰：‘臣闻高皇帝困于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数所。平城之饥，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围反位，而无忿怒之心。夫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不以己怒伤天下之政。故乃遣刘敬奉金千斤以结和亲，至今为五代利。孝文皇帝又尝一拥天下之精兵，聚之广武、常溪，终无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无不忧。孝文悟于兵之不可宿，故复合和亲之约，此二圣之迹，足以为效矣。窃以为勿击便。’”按：今《史记·韩长孺传》无文，见《汉书·韩安国传》。又卷六百六引《史记》：“百名以上则书于策。”《仪礼·聘礼记》：“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又卷六百一十四引《史记》：“始皇诸生到者拜为郎七百人，密种瓜于骊山，山温成实，令诸生就视说之，人人不同；乃为伏机，方难未定，机发，从上土填之。其坑在咸阳西南三望里，今为闵儒乡也。”按：今《史记》无文，见《史记·儒林传序》正义、《汉书·儒林传序》注、《后汉书·陈蕃传》注引《古文官书序》，《尚书·序》正义、《艺文类聚》卷八十七、《北堂书抄》卷一百又卷一百五十七、《太平御览》卷八十六又卷九百七十八引《古文奇字序》。

《说文系传·人部》“偿”字下引《史记》：“代王偿债。”按：今《史记》无文。“代王”当乙作“王代”，《汉书·宣元六王传》：“王得书喜说，报博士曰：‘……今遣有司为子高偿责二百万。’”即其事也。

（五）《太史公书》称引“史记”

《太史公书》尝称引“史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洪颐煊《读书丛录》、俞樾《湖楼笔谈》都有所论列，钱氏以为“皆指前代之史而言”，洪氏以为“所称‘史记’，当亦周、秦人所纪，非迁书”，其说皆是也；惟考辑尚未赅备，特因而补足之。

一事 《周本纪》：“周太史伯阳读‘史记’。”《正义》曰：“诸国皆有史以记事，故曰‘史记’。”

二事 《十二诸侯年表》：“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

三事 又云：“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四事 《六国年表》：“太史公读《秦记》。”《索隐》：“即秦之‘史记’也，故下云：‘秦烧《诗》、《书》，诸侯‘史记’尤甚，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是也。”

五事 又云：“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故以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

六事 又云：“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

七事 《天官书》：“余观‘史记’，考行事。”

八事 《陈杞世家》：“孔子读‘史记’至楚复陈，曰：‘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